

河道总督 (连载)



杨义堂

第二十二章 追腥臭小人作乱

第二天已经日上三竿,别人早就离开河漕总督署去上任了,徐州兵备道副使林绍才醒来,他慢慢收拾了东西,从城北的清江浦翻坝过河,又雇了一辆骡子车,无精打采地去徐州上任。

林绍才担任的徐州道副使,是明朝中期开始在省级下面设置的分巡道,为明中后期一项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重要制度,全称是南直隶提刑按察司副使,驻守徐州,既行使司法及监察权,同时也隶属于兵部管辖,当地卫所的驻军由他调遣,又称兵备副使、兵备道,还负责驻地的军事守卫、擒捕盗贼、屯田征粮、督修水利、修理城池等。

林绍才乘坐骡子车来到徐州城外,看到这座城池不是四方形,而是半圆形,南面是东西向的护城河,护城河北面是高大的城墙,中间有一座瓮城,城门上有箭楼。护城河上有吊桥,有城门官看守,林绍才让驾车的人喊话:“这是新来的徐州道副使,快让你们知州和道衙门的人来接!”

吊桥放下来了,林绍才却让驾车的停下,继续喊话:“快去州府和道衙传话,新任的林副使来了!”

城门官跑过来,打开骡车的帘子一看,果然是一位穿着红色四品官服的老爷坐在里面,吓得连声告罪,飞也似地跑进城门传话去了。

不一会儿,徐州知州和徐州兵备道的官员们都出来迎接了。徐州道衙门的人还带来了仪仗队和八抬大轿,林绍才看到这个场景,这才满意地从骡子车上慢慢下来,和众迎接的官员拱手作揖,然后坐上轿子,前面铜锣开道,响鞭净街,轿夫们高喊起轿,南北大街上各色人等纷纷避让,八抬大轿一路耀武扬威地来到徐州道衙门口。

兵备道衙门位于徐州城东西大街的东半部,西半部是州衙,道衙门坐北向南,大门对面是高大的照壁,照壁两侧有东、西辕门,大门前有一对大石狮子。林绍才下来大轿,看到大门上有一副对联,他留足细看,上联是:地居黄运中,水欲治,漕欲通,千里河流,涓滴皆从心上过;下

联是:官作军民主,宽以恩,严以法,一方士庶,笑啼都到眼前来。忍不住莞尔一笑,哼了一声,说:“这个写对子的还挺有才啊!”

林绍才来徐州分管河道的同知和丰县、沛县、砀山、萧县四个县的县丞一起商量治河的事,他说:“这次河漕总督给本官的责任是,修筑自徐州黄河南岸玄黄二铺的月堤,并灵睢界内大堤五十余里,以及建磨脐沟滚水坝一座。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,因为今年多了一道程序,就是由巡盐御史来审核我们的账目,你们要马上到现场实地测量,算出需要的民夫、土方和款项来,必须另外加上两到三倍,然后报给本官,让巡盐御史审查,再交给淮安府库,等款项到了我们手里,就会刷下来一大半,所以,为了河工工程,必须多报,懂吗?”

几个县的县丞都急了,大声说:“潘河督怎么这样啊!怎么想方设法克扣我们的河工款啊?”

“是啊,为了显示自己是治河能臣,没有半点体恤之心,连民夫的口粮都要克扣,他怎么下得了手啊?”

“徐州百姓有福了,多亏林副使想办法,多给我们着想,要不然的话,等干干活,却结不了钱粮,我们怎么办啊!”

“对,林副使说得对,我们多报河工预算!”

林绍才心中暗喜,又问:“你们凭着多年的经验,潘河漕让在河道外面再修筑一道遥堤,对不对啊?”

一位县丞回答说:“自古以来就是分水,大水来了,因势利导,让水自然流到海里就行了。”

另一位也随声附和,说:“这次潘总督让修遥堤,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!”

林绍才听了,心里更加高兴,频频点头,觉得这些县丞都是长期治水的,说得肯定没错!他又想起来淮安盐商张云说过的潘季驯与江一麟能够联手做局、控制盐价的事,这次他潘时良可要栽在自己手里了!向朝廷显示自己才能和忠心的机会来了! (未完待续)

荐书堂

主办单位: 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



《大胶济》

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《大胶济》以博大宏阔的历史架构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,交织构建起了一部全景式的历史画卷,展示了胶济铁路自建设之始至20世纪30年代末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。



《真正的归宿》

2011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接受了采访。在这本访谈录中,埃尔诺谈论了自己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,以及她赋予写作的政治、社会意义。

(本报记者 王艳茹 整理)

《重修阙里庙垣记碑》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(公元1282年)十二月,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。此碑高0.68米、宽2.08米。碑文由杨桓撰写,共43行,每行20字。此碑记载了当地官员在至元十九年秋冬季节,重修阙里孔庙院墙之事。

碑文回顾了重修庙垣之事的缘起与经过。前一次大规模重修阙里孔庙还是在金明昌年间,《孔氏祖庭广记》有相关记载:“其役因旧以完葺者才居其一,而增创者倍之。盖经始于明昌二年春,逾年而土木期构成。”明昌初年的工役规模浩大,新建众多楼台廊阁,历时三年才告成。但此后由于金元易代,战乱频仍,洒扫庙户纷纷逃亡,无人维护孔庙,而主祀者财力单薄,无法再次进行大规模重修。此时元朝也有意重修,但军国庶务众多,暂时未能筹措此事。在至元十九年重修孔庙之前,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陈祐等长官曾督谕下属,对阙里孔庙,要“为救废之举”。等到至元十九年秋七月,事情迎来了转机,奉议大夫同知济宁路总管府事刘侯拜谒了阙里孔庙,他认为周围庙垣坍塌剥落,亟待重修,于是与同僚商量此事,最后命孔子五十三代孙孔治重修。周围百姓一听说重修庙垣,纷纷带着筑墙工具来帮忙。在官府、孔氏族人的主持和周围百姓的参与帮助下,工程很快告成,众人还计划等到第二年春天,种植一千株松桧。时任济宁路教授杨桓目睹此事,受到孔氏族人的委托,于至元十九年冬十二月,在孔庙墙壁间题写了这篇碑记。

碑文提到了与此次重修孔庙事相关的诸多人物,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孔治。作为“权主祀事”,他



曲阜碑刻(三十八)

至元十九年

重修阙里庙垣记碑

尹一航

负责主持本次重修庙垣,出力甚多。孔治,字世安,孔子五十三代孙。根据《孔治神道碑》的记载,其曾祖父孔元用生当金季乱世,元兵兵锋直指金王朝都城燕京,此时衍圣公孔元措随金王朝南迁开封,孔元用以孔元措堂弟的身份留守曲阜、权主祀事。鉴于元兵压境,为保全林庙,孔元用率族人降元,元人命孔元用袭封衍圣公、世袭曲阜县令。不久,孔元用在率兵攻打益都时阵亡,孔元用长子孔之全袭封衍圣公及曲阜县令。公元1234年,金亡,孔元措返回曲阜,此时由哪方出任衍圣公成了一个悬案。经过协调,孔之全让出衍圣公之位,但保留世袭曲阜县令职位。公元1251年,孔元措病没,无子嗣,侄孙孔洙袭爵。旋因宗族哄然上讼,孔洙失爵,自此衍圣公之位空缺长达四十余年。中统元年(公元1260年),孔之全长子孔治承袭曲阜县令,后在中统四年(公元1263年)权主祀事。至元十三年(公

元1276年),孔治“授承事郎、曲阜县尹兼管诸军奥鲁,仍权祀事”。元贞元年(公元1295年),孔治赴阙朝见,皇帝特授其中议大夫、袭封衍圣公之职,给四品印。立碑之时,孔治的官职是“曲阜县尹兼诸军奥鲁、权主祀事”。奥鲁为蒙古语音译,指元代管理军人家属的机构。黄时鉴《元朝史话》:“在元代,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军人的家属,称为‘奥鲁’(蒙古语,原意为营、营盘),奥鲁官的职责是管理军户、签发军役和征收封桩钱。”

本碑撰文者杨桓,时任济宁路教授,是本次重修庙垣之事的亲历者。杨桓,字武子,兖州人。“幼年读《论语》至‘宰予昼寝’章,慨然有立志,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。弱冠,为郡诸生,一时名公咸称誉之。中统四年,补济州教授,后由济宁路教授召太史院校书郎,奉敕撰《仪表铭》《历日序》,文辞典雅。”杨桓从小便立有志向,博览群书,成为郡诸生,受到了当时名流的赞誉。后来杨桓迁为秘书监丞,至元三十一年(公元1294年),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《元史》对他的评价是“为人宽厚,事亲笃孝,博览群籍,尤精篆籀之学”。

孔治是继孔元措之后,对元代孔氏家族的又一个重要的人物。他袭封衍圣公,成功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衍圣公之位的空缺,且热心林庙,有志于奉祀的恢复和庙庭的重修。本次重修阙里庙垣,由济宁路主导推动,但具体工役是由孔治负责统筹规划,且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。由此看来,他之所以能权主祀事,进而承袭衍圣公,与他的能力、功绩和族人的拥护是离不开的。